

# 借來的生命

## —— 中譯《動物農莊》因緣

用俗語說，中譯歐威爾的《動物農莊》是我「收山」之作，趁此機會不妨就翻譯這門功課試遣愚衷。我就讀台灣大學外文系的時期（1956–1960），翻譯並不是一門「重頭課」。朱立民老師那時剛從Duke拿了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回來，教一科翻譯，我是四年級生，選了。

那年考進台灣各大學的外文系同學，選的科目雖各有名堂，但為了出洋，多把精神放在「實用英語」上。朱老師選了Arthur Miller的《推銷員之死》作教材，要我們在堂上輪流即時翻譯。

大學畢業後，當年《現代文學》諸子各奔前程，但知王文興留台在外文系任教，白先勇在加州Santa Barbara校區教中國語言和文學，我自己的第一件差事則在Ohio州的Miami大學當講師，時維一九六四年。我跟英譯中國文學的因緣，自那一年開始。

在美國大學教授中國語文的教材，歷史悠久，教材多有選擇。相對而言，英譯中國文學，幾乎可說現成的譯本都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陳年舊作。那年頭要介紹《紅樓夢》，唯一可用的教材是老前輩王際真先生的Anchor Books。一個學期下來，中國泰山北斗的煌煌巨著在一班美利堅合眾國童男女童的心目中

只是一本集爭風吃醋之大成的言情小說。《紅樓夢》為何又可稱作《石頭記》？憑此譯本的簡易文理猜度，實難看出什麼道理來。

為了增補中國現當代小說的英譯教材，我跟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教授過去十多二十年合編了多本短中篇小說選給授課老師選擇。

在別人翻譯的舊作中選材、修訂和編輯的工作，感覺跟整理自己的舊譯作再版時可不一樣。首先，別人的舊作不是你挑選的，譯文之好壞，亦非你一人能定奪。公事公辦的譯文，沒有譯者投入的「感情因素」，文字看來就會拒人千里。

我運氣好，第一本我主動向香港美國新聞處要求翻譯的作品瑪拉末的《夥計》順利出版 (1971)。《夥計》故事，簡單說來，是一個「壞人」傷害了他的恩人後拚命追求做補贖的故事，一個非常接近俄國大小說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終生關懷的《罪與罰》情意結發展的因果。夏志清先生論中國新舊小說，認為一大缺憾是宗教情懷之闕如。(李豐楙和廖肇亨合編的《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悔書寫論集》中「救度」一詞想與「救贖」同義。)

本文以「借來的生命」作標題，是一個 Confessional Note。我們唸外文系的人，看到人家值得外傳的作品，自己寫不來又想公諸同好，唯一的辦法是自己動手翻譯過來。當年鼓勵我翻譯《一九八四》的人，第一位是我老師夏濟安，第二位是舊交林山木。今日督促我翻譯《動物農莊》的人是多年老友詹德隆 (T. L. Tsim)，在此一併謝謝他們給我的鼓勵和支持。「戰爭是和平/自由是奴

役/無知是力量」——這種反常識、反理性的話，一定不能任由它代表真理。「大洋邦」代表的是什麼一種惡勢力，一定得通過翻譯讓世人知道。我的角色，因此只是借歐威爾的生命來扮演他的代言人。

《動物農莊》是《一九八四》的姊妹篇，除我現在準備付梓這個版本外，市上亦看到其他版本，特別是台灣多家出版社印行的。有此一說，一本偉大文學作品的翻譯，每二十年應是一個新世代，因為二十年來的風物、人情、語言在新時代的人聽來看來都「老套」了。此話作不了準則。十九世紀俄國大小說家托爾斯泰等巨匠的英譯幾乎由「奇女子」Constance Garnett (1861–1946) 一手包辦。過去十多年的時間，新一代俄國文學專家人才輩出，但「奇女子」的英譯沒被淘汰，或取代。不少人就是愛讀她維多利亞式的英文繼續做她的「擁躉」。我翻譯的理由不宏大，只是年初準備再版《一九八四》時的校訂工作令我有衝動接着翻譯這本姊妹作。我想借歐威爾再說一次這個恐怖惡勢力。

在《動物農莊》中，歐威爾把史太林和勢不兩立的對手托洛茨基雙雙變為別號拿破崙和雪球的公豬。因有讀者或BBC的聽眾不時問到：《動物農莊》是不是「反共」作品。歐威爾一直堅持他絕無惡意詆毀「社會主義」事業的意圖，動機不外是為民主西方社會留存一部《警世通言》，好讓他們在種種煽動的、危險的「社會主義」論調中保持清醒、提高警覺。

其實如果拿《動物農莊》作寓言看，折射出來的有關人類和

動物雙雙墮落的層面更見恐怖。動物先瞧不起用兩腿走路的人類，後來亦跟着墮落，自己也學着用兩腿走路。《動物農莊》端的是有關人畜墮落的今古奇觀。結尾一段文字，讀來更像有志怪色彩：

十二個嗓門同時憤怒地叫喊着。他們何其相似！如今不必問豬的面孔發生了什麼變化。外面的動物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再到人；但他們已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

劉紹銘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